

印度馬哈拉諾比斯教授
訪華統計報告集

統計出版社

印度馬哈拉諾比斯教授
訪華統計報告集

(內部發行)

統 計 出 版 社

1958 年 5 月

印度馬哈拉諾比斯教授
訪華統計報告集
(內部發行)

*

統計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三里河)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75號

國家統計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內部發行組發行

*

787×1092毫米1/32· $3\frac{11}{16}$ 印張·67,000字

1958年8月第2版

1958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1,301—2,330

書号：3006.112

定价：0.40元

編 輯 說 明

印度統計學院院長、印度政府統計顧問、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主席 P·C·馬哈拉諾比斯教授，應我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邀請，于1957年6月19日至7月12日在我國作了為期二十四日的講學訪問。

馬哈拉諾比斯教授在訪問我國期間，曾在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作了關於抽樣調查和數理統計的報告，並就有關抽樣調查的問題舉行了幾次座談。這本統計報告集，就是將馬哈拉諾比斯教授的這些報告和談話的記錄或提綱收集起來編成的。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國家要對社會主義經濟實行計劃管理，就需要經常地全面地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的活動情況。因此，我國從創立統計工作以來，就把全面調查作為對國民經濟進行統計觀察的主要方法，把定期報表作為調查統計的最重要武器。這在过去和今后，都是正確的和必要的。

我國又是一個地大、人多、經濟還比較落後、經濟情況又相當複雜的國家。只靠全面調查，還不能滿足各方面的需要。經驗證明，統計的武器要多，除全面調查外，我們還必須採取各種非全面調查的方法。而在非全面調查中，抽樣調查是最完善、最有科學根據的方法。因此，抽

样調查在我国也是統計觀察的一項重要武器。

印度应用抽样調查的規模很广，对抽样技术和調查方法都有所發展。馬哈拉諾比斯教授对抽样調查法素有研究，同时，他对我国的定期报表制度有很好的評价，对在我国应如何采用抽样調查十分注意。因此，这本統計報告集將對我們研究和运用抽样調查有所帮助。其中对有些具体問題的看法或有与我們不尽一致之处，也可以引起我們进一步的研究。

这些報告和談話，是由国家統計局、人民大學的一些同志譯成中文的。本社編輯部曾就譯文加以編輯整理。編竣后未經馬哈拉諾比斯教授看过。

和馬哈拉諾比斯教授同来我国訪問的拉希瑞教授，也参加了訪問期間举行的報告和座談。他所作的有关抽样技术的兩篇報告，也作为附录收入本集。

統計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2月

目 錄

抽样調查的一般原則.....	1
有意抽样和隨機抽样.....	7
關於職工和農民家庭收支調查問題.....	13
誤差的計算和控制.....	22
根據印度的經驗，談談抽樣調查的幾個問題.....	27
(一) 講演提綱	27
(二) 講演記錄	33
(三) 問題解答	37
以交插抽樣控制抽樣調查的問題.....	44
(一) 講演提綱	44
(二) 講演記錄	54
(三) 問題解答	62
數理統計的發展和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	
(講演提綱)	64

附 彙

一、 拉希瑞教授在座談抽樣調查問題時 的發言.....	84
二、 拉希瑞教授關於“隨機抽樣”的技術 (方法)問題的講話.....	90
(一) 講話提綱	90
(二) 講話記錄	103

抽样調查的一般原則

(1957年6月24日)

這是 P·C·馬哈拉諾比斯教授來華訪問期間的第一次談話，參加這次談話的有：馬哈拉諾比斯教授，拉希瑞教授，國家統計局薛暮橋局長和王思華副局長。在薛暮橋局長就國家統計局成立以來所進行的工作以及我國統計工作的一般情況作了介紹之後，馬哈拉諾比斯教授開始了下面的談話。——編者

本人感謝薛局長對中國統計工作確切而明智的說明，使我很清楚地了解了中國的統計工作。

我所準備要談的話，可以分三個步驟進行。在第一個階段獲得你們同意之後，才進行下一步驟。如果第一、二兩階段的談話都獲得同意，我就準備取消到中國各地觀光的日程，同時緩期離此赴香港，以便與貴局合作，商討抽樣調查的具體進行方法。

談話步驟

我準備的講演和談話的三個步驟是：(1)一般原則的介紹；(2)如果同意我所陳述的一般原則，就進一步較詳盡的討論這些原則；(3)大家又都取得同意，我將以抽樣調查工作上最重要的一方面，即“抽樣調查的設計”進行研討。

今天的談話，只限于第(1)項中的一些論點。

一、概 原 則

一个集中形式的機構（如一个工厂），在各方面都有詳細的帳目記錄可查，在进行統計工作时，使用全面調查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要調查的單位數目很多，地区分布很广，又沒有帳目記錄（如农户），那末就應該用抽样調查搜集統計資料。因为在这种情況之下，抽样調查比較快，比較省錢，結果比較准确，而且又可以計算調查結果的誤差的限度。

例如，在中国的 6 万多个工矿企業單位中，使用全面調查是适合的，因为这些單位都有帳目記錄。但即使这样，以抽样調查來檢查工人數目或其他指标的数字的准确性、全面性等，或許还是必要的。

不論全面調查或抽样調查，都存在兩种誤差。第一种誤差是物理变異誤差。由于被調查对象随時間不同而有所变異，因之調查数字只能是被調查对象在調查阶段的平均数，而这个平均数決不会同于該阶段被調查对象物質本身的具体波动（物理变異，例如，谷物的重量受空气中湿度的影响）。当这种“誤差”仅有1%或2%时，可以不必管它。第二种誤差是由于人的因素所引起的調查誤差（例如，計算錯誤、謊报数字、对指标誤解或曲解以及在分析阶段所發生的錯誤等）。調查量愈大，調查誤差愈大；由于抽样調查比全面調查的工作量小，其調查結果的質量就高得多。另一方面，如样本加大，抽样誤差就会隨之減小。在一般情况下，抽样誤差的減小率，总是大大低于調查誤差的增加率（当样本極小时，这种对比增減率的地位

就适得其反；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抽样誤差太大，調查結果所得数字，一般沒有什么用处）。因此，总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这时样本的大小，正好使抽样誤差小于全面調查的調查誤差，一般地說，这个阶段的到达，总比調查誤差“等于”抽样誤差的阶段早得多。在抽样誤差和調查誤差大体“相等”的情况下，抽样調查的結果确較全面調查的結果好。

在經濟落后的国家中，調查誤差一般是比较大的。文盲較多是一个因素；交通不便也是一个因素。比如，交通不便时，濶职的調查員可能故意的漏掉一些調查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調查实际上并不全面。

農業，家庭收支，人口等統計，用抽样調查会得到較准确的結果。国家統計局应当有自己控制的抽样調查工作人員，散布全国。当調查对象分散而数目众多或缺乏可靠記錄时，国家統計局都应有自己直接控制的工作人員进行抽样調查。

根据印度的經驗，如果只是要求所搜集的資料能夠代表全国的情况，那末，1,200人就夠了。但是，如果要求資料有分省的細数，那末，起碼需要2,500人。至于最后所需人数的多寡，就得看統計項目的繁簡如何而定。

抽样調查与全面調查

美国1950年的人口普查，耗費1.2亿美元，但經過抽样調查方法檢查的結果，發現仍漏掉了約300万人口。

在苏联，以全面調查方法所取得的农作物产量数字，我听說，还没有一定的把握。很多在苏联負責統計工作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曾經来过印度，并住在我家作

客，因此我們有机会坦白的交換意見。我現在的談話，也同樣根據這種直率坦白的精神。蘇聯在1928或1929年，就開始使用抽樣調查。很自然的，在當時所用的方法是“有意抽樣”，因為在那時，這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隨機抽樣”在世界各國的大規模使用，只不過是近十年至十五年的事情。因之，我們發現，在蘇聯的新起部門中，如許多工業部門中，他們使用的抽樣法，和印度及西方國家所用的毫無兩樣。

在印度，全面調查在原則上僅用于農作物播種面積的統計。從事調查的人員，約有5萬之多。用抽樣調查複核的結果，證明這些數字的誤差限度非常大。

這些事實說明獨立的复查是必要的。在一個大國里，在農業中用抽樣調查是必要的。

隨機抽樣與有意抽樣

抽樣調查的方法有二，即隨機與有意抽樣。

早在1925或1926年，英國統計學者A·L·波里在國際統計學會作過一次關於抽樣法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提到隨機與有意抽樣。在1930年，意大利統計學者卡瑞多·金里又作了一次關於有意抽樣實驗結果的報告，這次報告的根據是1927或1928年意大利利用有意抽樣所進行的人口調查的結果。他的報告，說明了有意抽樣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印度在1937年開始使用隨機抽樣法，美國在1929年經濟蕭條後，也於1936年左右開始用隨機抽樣來調查失業人數。從那時以後，美國使用隨機抽樣於工業、商業及勞動

* 原文為 Purposive Sampling——編者注。

統計方面有長足發展；而印度則多着重于抽樣調查在食物、農業、人口、生活條件等統計方面的應用。

聯合國抽樣調查小組委員會討論了五年（1947—1951年）之久，我自己也參加了這些討論，結論認為隨機抽樣是比較優越的方法。

我曾就這個問題和蘇聯專家們討論過。

關於研究機構

統計研究學院直接隸屬於國家統計機構，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重要之點，在於研究機構欲發揮其力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必須有獨立的學術思想，第二是必須和實地工作有密切的聯繫，使其研究方向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

現代統計工作，不僅需要能幹的統計學者，而且需要數學與工程人才及其他科學家。因之，一個統計研究機構，必須和其他科學團體有密切聯繫。當然，統計主要是用於社會經濟調查，所以，這個研究機構必須和國家統計機構有密切聯繫，但它同時也必須和其他科學研究機關保持聯繫。在這一點上，印度對統計學的看法，是廣義的看法。這就是說，我們相信統計工作雖然以社會經濟調查為主，但其範圍決不僅此。生物學、工程學以及許多其他科學也需要統計。

這個研究機構可以不時擔負一些日常的統計工作，但絕對不能要求它用全部的時間做這種工作。表示研究機構獨立性的標誌之一，就是研究工作雖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但並不要求它任何时候都非如此不可。這個研究機構進行研究的題目，也許有很多對任何實際問題的解決並

未能立即有所貢獻，但仍然應該讓這些研究工作者有效地進行他們的研究，對他們研究的方法也不應予以干涉。

一個研究機構同時也應該訓練人才，但它不應擔負訓練大批中初級統計人員的責任，而應專門致力於統計教師和研究人員的訓練。訓練人才本身也就是一門科學。

一個統計研究機構在性質上是和一所医学院一樣的。一所医学院如果沒有醫院的聯繫，提供學生以實習的機會，是不能想像的。同樣的道理，一個統計研究機構如果不和實際工作機關聯繫，而想給學生以正確適當的訓練，也是不可能的。總之，一個統計研究院一方面要和實際統計工作有密切的聯繫，同時也應保持其在基本研究工作中的獨立性。

有意抽样和随机抽样

(談話記錄，1957年6月25日)

王思華副局長：馬哈拉諾比斯教授昨天談到，蘇聯在1930年左右，曾應用“有意抽樣”，請明確其具體內容。它與“隨機抽樣”有什么不同？

馬哈拉諾比斯教授：抽樣調查方法是從1920年開始大規模應用的；在1920年以前只有零零碎碎的應用。自然，普通人民買水果時，實際上也應用抽樣的方法，但我們這兒並不是指這種性質的抽樣。1926年，A·L·波里教授在國際統計學會作了一個科學報告，第一次討論了抽樣的方法。他這次報告中，談到隨機抽樣和有意抽樣。這時候，許多統計學家對抽樣方法已開始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蘇聯於1927年在涅姆其諾夫院士（他現在已有七十多歲了）指導下，在農業生產方面做了許多抽樣調查工作。1930年以後，涅姆其諾夫院士對於抽樣調查的方法已較有把握，並將它應用在其他方面。但他所應用的主要的是“有意抽樣”（或稱“代表性的抽樣”）。這種所謂代表性的抽樣方法，印度在1920年左右的作物調查中也曾應用過，即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村子，根據它們的數字來推算總體。我是相信機率而不相信‘代表性’的。美國的“定額抽樣”方法，也相當於代表性的抽樣。定額抽樣方法的基礎是以主觀推測的總體組成來規定樣本的組成，這是很主觀的，因為首先要知總體的組成後，才能確定樣本的組成。美國蓋洛

普民意測驗，就是应用定額抽样方法的，但它在1948年預言總統競選結果时是完全失敗了。美國政府举行調查时常用隨机抽样；而私人企業舉行調查时，則用定額抽样，因为定額抽样可以少花錢。蘇聯在工業產品質量的檢查方面完全用隨机抽样的方法，1954年曾有一个報告。蘇聯所应用的这种方法和美國的質量控制檢查方法是差不多的，只是更簡單化一些（簡單的部分是全距）。美國現在每年有失業就業的調查和工業調查，每十年有一次人口調查。并用抽样的方法来檢查調查的結果。檢查共二次，如1950年美國人口普查后，就派了最优秀的統計人員采用抽样的方法去檢查普查的結果；又派了更高級的統計人員采用抽样的方法去檢查上述抽样檢查的結果。在檢查結果中，發現1950年的全面普查漏掉了300万人。英國在農業調查中也应用隨机抽样的方法。瑞士在農業和林業的調查中也完全应用隨机抽样方法。日本在战后也采用隨机抽样的方法作了許多調查。所有这些国家进行抽样調查大都是最近十年的事。美國是1936年开始的，英國是1930年开始的，印度是1935年开始的。1947年聯合國开始設立抽样調查小組，十年來一共开了五次会。第一次會議專門討論術語的標準化問題，这一工作現已基本上完成。我在1942年寫了一篇關於抽样調查方法的論文，1944年在英國發表，文中举孟加拉省農業調查为例來討論抽样調查方法。四、五个月以前，國際統計學會出版的統計術語辭典，才对抽样調查的涵義作了解釋，并第一次介紹了交插抽样的概念。這一辭典以英、法、德、意四国文字印行。总的說來，現代的抽样調查是統計方面很新的發展。从1930年开始，蘇聯的統計工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先进，蘇聯的国民收

入統計和農業統計都是很有基礎的。蘇聯的統計組織是最集中、最大規模的，這點使我十分欽佩。但是，蘇聯在農業和家庭收支調查方面所應用的抽樣方法却已落後了。我曾在抽樣調查方面和蘇聯的統計學家們交換過許多意見，據我所知，蘇聯的許多數理統計學家，如皮撒列夫等都曾主張採用隨機抽樣方法。1955年初，在蘇聯中央統計局方法處的一個報告中，曾提出了抽樣調查方法特別是在家庭收支調查中應用抽樣調查的問題。我相信，他們需要一段醞釀的時間，但如一經決定採用隨機抽樣方法，那末改變一定會很快的。至於蘇聯最近的情況如何，我還不太清楚。

現在我進一步解釋定額抽樣和分層隨機抽樣。如果事前對於客觀的事物沒有一定的知識就進行分層，那末這種分層是主觀的。如果事先已掌握了某種知識再進行分層，那末這種分層是客觀的。層不是由調查員到目的地才分，而是事先確定的。分層後不是有意抽樣，而是隨機抽樣。分層有意抽樣與分層隨機抽樣的區別在於：分層有意抽樣是主觀揣測，分層隨機抽樣是客觀的。所謂分層，應有一定的標準的比例數字，否則就不能分。比方現在有許多民族的人士到北京來開會，我們如果要想作幾個民族的調查，這時只能根據各民族人數的比例作分層抽樣調查；如果不知道這一比例數字，那就不可能分層，即使分層了，也是主觀揣測。再舉個例子，如果某一集會中有1萬人，我們想去調查他們的年齡、高度分配等。參加這一集會的有工人、農民、工程師、機關職員等，那麼應按什麼比例來抽樣呢？如果採用定額抽樣的方法，按照人口普查中這些人的比例去抽選樣本，顯然是錯的。如果調查員站

在大會的門口，每進去一個人就問一下他們是干什么的，這樣掌握了集會中工人、農民、工程師、機關職員等的比例數字，然後按這比例去抽樣調查，那是對的。至於隨機抽樣調查，則是事先不假定有這種比例，由調查員跑進去隨機地抽，抽出後再發現這個比例。如果你事先掌握了正確的定義，又知道了正確的比例，按照這種比例去抽樣，其結果和隨機抽樣的結果是會相同的。抽樣時，無論如何不能含有主觀因素，隨機抽樣就是要客觀地去進行。根據印度的經驗，任何一次抽樣調查，如果發現有主觀成份，就一定會發生偏差。印度測量小麥產量時，用一個圓圈進行實割實測，就是由調查員拿着圓圈跑到田里去丟，丟到那裡就測到那裡。如果調查員開着眼睛去丟圓圈，由於調查員潛意識的作用，他往往把圓子丟到吸引他的地方，結果圓子裡的產量常常是比圓子外邊的產量多。如果調查員閉了眼睛去丟圓子，這種偏差就不會發生了。有趣的是，圓小會發生較多的偏差，圓大些發生的偏差少些。我有一篇歷年數字比較的論文談到這個問題，過去我們用方形的圓子會發生偏差，現在我們改用圓圈了。先用小圓確定地位，再在外面畫一大圓圈，割大圓圈內的作物。

王思華副局長：中國各縣的領導者，對農村情況較熟悉，都希望採用典型抽樣，亦即有意抽樣，對隨機抽樣在思想上還搞不通。如果對實際情況較為了解時，是否用“有意抽樣”較好？

馬哈拉諾比斯教授：如果對實際情況知道得很多，採用隨機抽樣也沒有損失；隨機抽樣能確定誤差，而有意抽樣則不能確定誤差。

隨機抽樣有二個優點：（1）比較簡單快速，（2）

有理論上邏輯上的根據。

有意抽樣只能根據一、二個指標來研究和確定其代表性，如果研究的指標較多，則代表性就難以確定了；而隨機抽樣則不受指標數目的限制。

孫治方副局長：純粹隨機抽樣好，還是分層隨機抽樣好？

馬哈拉諾比斯教授：如果分層不是分得太多，則分層隨機抽樣較好；如果分得過多，就失去分層的意義了。

我們進行抽樣調查時，如果同時採用兩種辦法，一是隨機的；一是有意的。如果二者的結果相同，那末兩種辦法都是正確的。按照機率理論，隨機抽樣的方法是可靠的。如果二者的結果不同，那末一定是有意的抽樣搞錯了。有意抽樣決不會比隨機抽樣好。

如果分層，每層分得很多很細，那麼用有意抽樣還可以。但假定從一萬個合作社中，每社選出一個代表戶，共計一萬戶，這一萬戶實際上是不能代表一萬個合作社總體的。因為從每個社中選出的代表戶可能是中等的戶，沒有最窮的，也沒有最富的。但如用隨機抽樣法，則最窮的最富的戶都可能抽到，都可以知道。又如在一個學校中每班抽出一個作為代表的學生，這個學生是按每班的平均成績抽出的，他並不能代表學校中學生成績的真實情形（真實的情形應是：有的高於平均成績，有的低於平均成績）。隨機的樣本則代表的不是平均成績，而是有高的和低的成績。這種隨機樣本是總體的縮影，而不是平均數。而且有意抽樣只能根據成績一個指標來確定作為代表的學生，縱使樣本在學業成績上能代表全校學生，但在身高、體重等方面就不能代表。至於隨機樣本，則不論學業成績、身高、體